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书而思

中国为何缺少有世界影响的抗战史著作

□ 赖某深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然而，作为一个战胜国，我们却缺少有世界影响的抗战史著作，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多用中文写作，缺少国际交流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大多是用中文写作，主要是面向国内读者，而不太重视国际影响与国际交流。为什么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过去在欧美一直鲜为人知？为什么与欧洲犹太人遭到屠杀相比较，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恐怖很少为亚洲以外的人们所了解？欧美学者不太重视中国战场，在其二战史著作中对中国战场一笔带过固然有客观原因，更重要的因素则是中国学者不擅长用英文写作历史著作。美籍华人张纯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出版后，在欧美引起轰动，以致有人开玩笑说：“唐德刚、章开源研究大半辈子南京大屠杀，还赶不上这个小姑娘引起如此轰动，真是叫人跌破眼镜。”（章开源《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这既是自嘲，也是实情。因此，今后应多出版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抗战题材外文著作，加强国际宣传和国际学术交流，以扩大国际影响。

研究方法较单一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单一。过去，我国史学工作者比较擅长阶级分析和历史考据方法，而对于历史比较、定量分析、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不太重视，而欧美和日本学者恰恰在这些方面比较擅长。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既把南京大屠杀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屠杀进行纵向比较，又和二战时期欧洲国家平民死亡总数及日本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进行横向比较，从而得出了“即使与历史上那些最具破坏性的战争相比，南京的暴行也足以代表最可怕的种族灭绝的行为”的结论（《被遗忘的大屠杀——南京暴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这就很有说服力，视野更为开阔。定量分析也是历史研究的常用手法，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精确性。日本社会学家作田启一曾对339名被处刑的乙、丙级战犯的遗书进行研究，他将日本战犯们面对死亡的心情分为四种类型，即自然死型（自然而生，自然而死，对死无所追究）、代人受过型（相信自己无罪，是代替部下和长官而死）、奠基型（把死作为目标，自己做出这种牺牲）、赎罪型（承认自己犯了罪，承担个人的责任）。从遗书的内容来看，代人受过型占总数的53%，自然死型占29%，奠基型和赎罪型各占9%。（[日]入谷敏男《日本人的集团心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由此不难看出，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极少有人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战时日军对中国人特别残忍，战后日本人又拒不向中国谢罪和忏悔。在心理分析方面，日本学者野田正彰的《战争与罪责》和山田正行的《自我认同感和战争》均值得一提。前者通过讲述八名原侵华日军的故事，告诉人们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下，那些原本朴实、善良的日本青年是如何“由人变成鬼”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的精神科医生，他用解剖刀一样的犀利笔锋，对于加害者的心理分析得淋漓尽致。后者则采用实地考察和口述实录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滇西受害民众的战争心理历史的考察，将他们遭受的苦难和心中的伤痛传达给更多的日本民众，唤起他们的关注和良知。

多宏观综论，缺历史细节挖掘

我们过去的抗战史著作，多数都是宏观的综述和总论，偏重于从政治、外交和战略角度叙事，不太注重历史细节的挖掘和描述，更难以看到交战双方基层官兵在战争中的活动和感受。这既有战时中国军方档案草率、粗疏的原因，也有战后中国历史学者没有进行艰苦细致的文献检索和实地调查的原因。相比较而言，一些比较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他们费尽千辛万苦寻访侵华战争的老兵，又翻山越岭、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寻访战争的幸存者，通过对战争加害者和受害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写出了一些影响很大的战史著作，使人们对于当年那场战争有了更为真切的感受。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和感染力。可喜的是，近年来国内有的学者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像军队作家余戈的《1944：松山战役笔记》就开了“微型战史”写作之先河，他不是从宏观的、政治的、浮泛的角度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而是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字里行间仿佛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给人身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翔实、真切、细致、可感。为了写作此书，作者查遍了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所能寻访到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踏遍了松山战场的每一个角落。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加上生动细致的文笔，使此书刚一问世，就被行家评为“从廓清史实到文学价值都足以与外国同行们比肩的战史文学”，这并非过誉。

战后70年来，作为战胜国的美国、苏联、英国都出版了大量的以二战史为题材的战史著作。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出版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的二战史著作。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我国至今尚无一部与这种贡献匹配的抗战史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界的憾事。

康熙的读书之道

□ 王　煦

清朝康熙皇帝是中国封建时代一位贤德有为的君主，其功业事迹广为人知。康熙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与其多年的知识积累和能力训练有很大关系。康熙勤学好读，在古代帝王中是少见的。“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未有不以讲学明理为先务”。为此，他身体力行。据其自述：他五岁即知读书，八岁登基后学业大进，到十七八岁，更笃于学。他每天五更（凌晨三到五点）起床先读书，晚上处理完公务，再和大臣讲论研习，以至一度积劳成疾，“痰中带血”，但即便如此也没停顿学业，可见其用功之勤。成年之后，日理万机，仍学习不辍。“朕于政务余闲，惟日研精经史。”每天他坚持与文臣讲说经典，虽风雨寒暑，南巡北狩，都不间断。康熙的读书治学态度，久为后人所称道。

以经典著作为阅读根本，同时博览群书

康熙的阅读书目，以中国传统经史典籍为核心：“自古经史书籍，所重发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览详求，使成内圣外王之学。”特别是对儒家经典，更是视为根本，反复研习。他评论“五经”：《周易》有天人感应的奥义，《尚书》有帝王政事的法则，《诗经》有表达人情的道理，《礼记》有讲求礼仪的内涵，《春秋》则有先圣的褒贬寓意。这些经典都是“智识精明，涵养深厚”，为“畜德”（积蓄德性）之根本。史书记载历代兴衰、治国之道，经验教训尽在其中，记事之间又往往暗寓褒贬，启德益智，也同样为历代帝王所重视，成为继儒家经典之后的又一类必读书籍。众多史籍中，《资治通鉴》“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最受推崇。经史典籍中所灌注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受到康熙的推崇，而达到其树立权威、为民轨范的效果。作为一位封建帝王，他所看重的经典以及秉持的观点、态度，当然有其保守迂腐的一面，但单就这种重视经典，重视核心价值，重视精神力量，希望通过经典弘扬道德、匡正世风的做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不同于多数被深宫遮蔽了眼目的封建帝王，康熙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求知欲望。在康熙的书单中，除了经史典籍这些“传统科目”外，还有中外古今方方面面的书籍。从诸子百家、佛经道藏、医卜星相、书画法帖，甚至西方舶来的天文历算等，康熙都有不同程度的研读，可谓是博览群书。对有些方面的知识，甚至还颇为精通。比如，他自称曾学习算术天文地理，“靡不详究”；音韵学研习了二十年，即便没去过的地方，当地人的口音都知晓；地理学也是自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哪怕边境荒野，也要考据书籍，务得其正。其中虽不免有些自负，但终可见其用功之深。当然，康熙选择“杂书”的标准，还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儒家经典的“义理”。对那些他看来是“芜秽不经之书，浅陋之文”，是绝对摒弃，甚至禁绝的。以经典义理为品评书籍的尺度，是否恰当？见仁见智。不过能依循一定的标准，处理好读书“精”与“博”的关系，还是非常必要的。

读书应树立志向，持之以恒

康熙认为，读书能坚持下来，学有所成，首先必须树立志向：“志为进德之基……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志之所向，无坚不入。”立下读书的志向，学习才有了前进的根本支撑和动力。立志之后，还要坚持不懈加以施行，不能间断。因为人心是最灵、最聪明的，但最灵、最聪明，也就最容易被诱惑、起杂念。即便立下了志向，也会变动不居，难以实现。所以必须坚持，才能心无旁骛。为此，康熙还特别撰写了一篇《读书贵有恒论》，告诫人们读书学习就怕始勤终惰。只有持之以恒，敦行不怠，才能“智日广而能日崇”，切不可朝勤夕懈、进锐退速，结果一事无成。

为了坚定志向、鼓励坚持，康熙还强调读书学习不可有畏难情绪。他嘲笑那些读书时总抱怨“我不行啊”“我做不到啊”的人纯粹愚人自误。学习，特别是初学，确实艰难辛苦，这时决不能畏缩放弃，一定要有“坚定不移之志”，同时又要具备“勇猛精进之心”“贞常永固、不退转之念”，锲而不舍，才能学有所成。

“读书”“讲论”“思虑”“行事”相结合

对于学习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康熙有一个“读书”“讲论”“思虑”“行事”四位一体的办法。他曾引宋儒之说：“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的好处是多，“讲论”的好处是快，“思虑”的好处是深，“行事”的好处是实。四者虽然并行，但实则不可偏废，要综合并用。康熙自己正是如此实践的。

康熙读书之多，前文已述，自不必说。“讲论”上，康熙认为单纯的阅读或听讲，往往一带而过，无法深入思考，甚至会使学习活动流于形式，所以必须通过亲身讲解、论辩，复述知识，整理思想，才能使学问深入扎实。所以在宫廷讲学活动中，康熙特别要求每次讲官讲完，他自己再讲一遍。遇到有一字一句疑惑未明之处，都要和大臣们反复讨论，一定要到义理贯通为止。而讲论的根本在于“思虑”，他曾说：“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读书讲学之后，若不思考，便是徒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所以康熙说他每次讲读学习之后，都要再三深思推究，务要做到道理明彻。

在思考和讲说之外，康熙还非常重视“行事”，也就是实践。他认为做学问当不尚空谈，唯有亲身践行，方能得益。而实践的对象，在康熙看来，就是平常的人伦日用：修身先从谨言慎行做起，齐家先从尊亲敬长做起，穷理先从读书论道做起。只有把崇高的理想、目标转化为“至近至易”之事，才好去践行、去贯彻，也才最容易见成效。为了对书本知识加以验证，康熙甚至进行科学试验。比如他利用旗子测风向，发现各地在同一时间风向不一，于是认为古语“隔里不同风”所言准确。他还用来华欧洲人传授的单摆测定声速法，实验《易经》中“震（雷）惊百里”的说法，也认为可信。总之，康熙力求把读书、思考、讲论、实践贯通起来，以不断提升学习的效果。

不可尽信书

由于在读书学习中重视思考、实践，康熙也养成了不尽信书的阅读观。他曾指出很多书籍，包括一些古籍正史的内容，往往不可完全凭信。记事出错，尚在其次，若是观点、道理谬误，则更加危险。所以他告诫子孙，看书不可被书所愚弄。他还例举汉代大儒董仲舒文章中的话“风不鸣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刮风不吹动枝条，下雨不冲散土块，就是升平世界——果真如此吗？康熙大不以为然：果真风不鸣条，那草木如何振作生长？雨不破块，田地又怎么播种耕耘？如此写法，无非是粉饰空文而已，不可信以为真。即便一些书中道理看来不错，康熙认为也不可过分拘泥。他举《礼记》中“昏定晨省”（即孝子侍奉父母，晚间要服侍就寝，早上要省视问安）为例，告诫皇子说：昏定晨省，无非是要告诉人们，做儿子的要竭尽孝心。读书人得其意蕴即可，不应拘泥文辞，非要每天早晚刻板执行。他拿自己打比方：朕子孙众多（康熙仅成年的皇子就有24人），每天早起都挨个来给我请一次安，晚上再都挨个来给我请一次安，估计我这皇帝连吃顿饭的闲功夫都没有了，根本行不通。所以“凡人读书，俱究其本意而得之于心”，就好了。

读书方法

众创众享新商业

□ 闫东良

从去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然而，在虚实交错、互通互联的新时代，企业如何做出改变、顺势而为、获得生机？年轻“创客”们怎样成为“人人创新”潮流的弄潮儿？《众创时代》一书，以众多先进企业案例为基础，全面勾画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C2C新商业生态圈模式，揭示了企业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C2C（即从客户需求到客户消费）商业生态圈模式，是指一批专业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供应商、增值服务商、中介机构、客户等），基于一个共同目标，紧密参与，为客户提供统一的解决方案，形成的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商业生态圈。美国的空中食宿公司（Airbnb）的发展，就精确诠释了企业是如何发展出新商业生态圈模式的。初期，空中食宿公司是一种简单的商业模式：为房屋所有者与个人旅行消费提供对接。后来，其业务拓展到为旅行者提供摄影服务、保险方案，还为旅行者提供地理位置、周边综合旅游信息、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安全检查服务等，并为供需双方提供解决争议、存款与支付服务等。

国内也有C2C商业生态圈的典型案例。10年前，青岛红领集团还只是一个传统的“矮小丑”服装代理制造商，每天只能生产80套男装，而现在，红领集团已经是一家全球化企业，其客户有60%来自美国，30%来自欧洲，只有10%来自中国。这些来自全球的客户，在网上自己设计，选择材料，定制下单，数据经处理后传递到工厂，计算机下指令给流水线，形成“个性化+柔性化+网络化”的批量生产。如果谁有创业梦想，还可以在红领集团的平台上开创一个自己喜爱的品牌，平台能为其提供一切创业成长需要的支持。

过去，消费者无法选择，今天却不同了，当世界相互连接、信息更加对称，人们的个性得到释放时，消费者就显得很难“伺候”了。那些崛起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创造了崭新的从需求到消费的新商业生态圈模式。这种新商业模式有三大核心：一是人文关怀。商家不仅为客户提供有用的产品，更将冷冰冰的产品变成有灵魂、有温度的，能承载所有参与者生命意义的东西，从而让商业更美好，让生活更美好。二是互助信任。即通过高度发达的网络，整合社会资源，鼓励人人参与和分享，形成充满信任的网络体系。那些崛起的企业，都极为重视信任问题，力求“让信任的人在一起，让在一起的人更加信任”。企业往往说到做到，坚守承诺，并用创新工具监督和避免人与人之间的不诚信事件发生。三是智能平台。这样的平台，就像一个超级机器人，在这平台之上，实现“无数客户即时设计，订单即时处理、即时加工、即时交付”的个性化规模定制。

商业模式决定企业的存亡、经济的兴衰。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探寻一种崭新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商业模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本书还侧重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详细回顾了世界商业史变迁，描述了正在形成的商业大势，列举了大量企业转型创新典型案例，对于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书海泛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8期要目

本刊策划
寻找发展突破点（共6篇）
刘迎秋　熊志军　洪银兴　蔡继明
张占斌　周跃辉　李旭章

治党论苑
全面从严治党新路与中共历史命运　张志明
警惕领导干部“为官不为”　郝春禄
邓小平对违反民主和法制十种现象的批评　韩光宇

改革纵横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相关问题解析　汤维建
事业单位消除行政化的制度保障——《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解析　丁晶晶
《人民银行法》亟待修法　胡继晔　李春梅

社会治理
新常态下民生和社会治理的新特征　杨英杰

热点观察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高校反腐的根本之道　熊丙奇

环球视野
英国保守党胜选探源　王　燕

◆微阅读

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景；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理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摘自爱因斯坦于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麦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

心的存在有两个作用：其一为观察宇宙天地万物；其二是反省、找寻、构思己之为己。从观察万物到深思自我，是一个整体的循环过程：观察万物必定深思自我，反之，深思自我又必定建立在观察万物的基础上。心的存在意味着人可以进行从外到内、从内到外的整合。

——摘自成中英《新觉醒时代——论中国文化之再创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书名：《众创时代》
作者：（美）吴霁虹　著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